

邱克威 (Kiak Uei KHOO)*

1930 年代“大众语”在新马的宣传及其对国语推广的影响

The promotion of ‘Popular Language’ during the 1930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pread of Guoyu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摘要：新马“国语运动”在 1930 年代进入“全盛期”，尤其在初期随着各种活动与组织的发展使“国语”的推广取得佳绩。然而 193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国内关于“国语”的一系列批评思潮与运动，尤其是 1934 年以来的“大众语运动”，新马华人社会也直接投入其中。1937 年进入抗战时期，“大众语运动”结合“通俗文学运动”与“新文字运动”，在新马华人社会中宣传“抗战救亡”的工作上取得了普遍的支持，并由此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新马“国语”的发展及其推广。本文首先从 1930 年代新马社会的语言环境，尤其是“国语”的教育与使用情况分析，了解“大众语”在新马文化界与知识界深受支持的社会背景；其次是整理当时针对“大众语”及其相关运动的讨论及其宣传活动，最后则探讨 1930 年代“大众语运动”给新马华人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国语”的推广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大众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Guoyu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entered a prime period in the 1930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y stage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activities and organizations pushed for excellent results in Guoyu promotion. However, a series of thoughts and movements started in China during the mid-1930s that aimed at criticizing Guoyu, in particular the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started in 1934, also affected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1937 when the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the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merged with popular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Latinization movement to achieve an excellent result in promoting anti-Japanese occupation movement. This exerted influence o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Guoyu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is paper, by means of examining the lingual environ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during the 1930s with respect to Guoyu education and usag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ocial factors behind the enormous support for the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After which exhibits the various topics of discussions and the means of promotion used with regards to the popular language, and finally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the popular language movement imposed on the Singapore and Malaysia Chinese community, especially i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Guoyu.

Keywords: Popular Language; Singaporean Mandarin; Malaysian Mandarin

* 邱克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雪邦，雪兰莪 43900，马来西亚，E-mail: KiakUei.Khoo@xmu.edu.my

1 绪论

邱克威（2020）分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二战前的“国语运动”发展为三个阶段，而其中第三阶段从1929年开始进入“全盛期”，其云：

至于以1929年为第三阶段的起始，则是这一年中国侨务委员会颁布《关于华校采用国语教授》通告，并由当时总领事唐榴登报重申，由此展开一系列针对学校与民间的国语推广活动。这时起才算是新马华人社会各阶层积极投入国语事业。

于是通过各地学校实行“国语教授”、各界定期举办“国语演说竞赛”、组织“中华国语统一促进会”举办“国语周”、成立多所专门的“国语学校”等措施，将新马社会的“国语”推广工作推向高潮。

然而深受中国国内各种社会思潮与运动影响的新马华人社会，在整个1930年代中国国内围绕着“国语”问题的热烈争辩中也同样积极投身其中，并作用于“国语”推广进程；其中1930年代中期关于“复兴文言”与“大众语”的两场论争尤为影响深远。

1934年汪懋祖发表《中小学文言文运动》等文章，引发一场激烈的文言文与语体文之间的论争，参加者包括陶行知、胡适、鲁迅、容肇祖等人（参看罗庆云、戴红贤2013）。此外，大约同时期广东陈济棠也发起“尊孔读经”运动，在广东中小学推行读经，乃至广东教育局编定《经训读本》作为学校教材（参看陈雪峰2008）。这股“复古思潮”在新马两地华人社会中都产生了影响，也引发一些辩论；最具代表的是梨涡从1935年4月新马响应“读书运动”开始，集中于8月前后针对读古书与学习文言而与胡流涛和水源二人逾一个月的激烈争辩，如胡流涛（1935）云：“我们步进‘南洋文坛’来看，看她这里是个什么样。首先是日常和我们见面的志生和梨涡二君的大作。他们最近的确在‘复古’路上走，让我们一个个来检讨吧。”然而除少数偏激者如水源（1935）称古书为“僵尸”，实则包括梨涡（1935a、1935b）在内的多数人都是主张折中观点的文言与白话并存，如风心（1935）的论断很有代表性，其云：“‘吃今不化’和‘吃古不化’真是以五十步而笑百步矣。”更有较早一篇社论就已明言：“折中两者之间，究以文白并存，较为不悖，其立论至平允也。”（留1933）

其实更重要的是，同时期由上海学界带动的一场“大众语运动”也一样在新马华人社会引发论争，而且相较于“复古思潮”，围绕着“大众语”及其相关问题的论争之影响更为深层，也持续更久。整体而言虽然有反对意见，但在文化与教育界的支持声音占尽了优势；尤其是紧接着1937年为了更有效地向一般民众宣传抗战，“大众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包括各地组织的“通俗演讲”、话剧演出，乃至“通俗文学”口号下促进发展的“南洋文学”。这时期“国语”的地位直接受到动摇，乃至“白话文”也受到不少非议，甚至还提出了“南洋大众语”的概念。

当然“大众语”的重要概念是“大众”与“通俗”，因此其影响于新马华人社会并能深入民心主要还是它切合当时新马华人社会的实际状态，即1930年代“国语”教育和推广仍有其不足，尤其一般社会民众仍不通行“国语”。比如配合抗战宣传在新马开展的“歌咏运动”，曾述其经验云：“有一次作者和一班歌咏同志在海王村入去的山芭教民众唱《保家乡》，虽然他们不很熟国语，但是他们学习的热情确实很使人佩服。”（力谦1940）于是当时为了有效宣传抗战，戏剧界也纷纷提倡“方言戏剧”，乃至文艺界提倡“方言文学”。

然而归根结底，“大众语”由于自身概念的模糊与不确定性，包括其理论与实践上的差距，于是包括胡适和鲁迅等多对其产生质疑；然而在新马华人社会中，虽然也出现一些反对意见，乃至同样地出现一些较偏激立场如废除国语与汉字，但由始至终主流意见仍属调和或折中的“过渡论”；即白话文确有其缺陷，尤其是当时所谓“欧化白话文”，而“大众语运动”实则是要使

国语更为大众化，乃至提倡方言或者“新文字”也都是实现语言文字统一的一种有效的过渡手段。尤其进入 1937 年的“抗战救亡”运动中，“大众语”概念有效地帮助宣传工作取得佳绩，因此更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

于是从 1930 年代中期以至 1940 年初，“大众语”在新马华人社会的宣传，正是那一层“先进”社会思潮的包装，如“扫除文盲”、“教育普及”、“国民素质”、“宣传抗战”等口号，使其合理地位不容置疑；即杜残（1935）所称：“有人说，反对大众语的，是思想落伍，顽固守旧，不知道社会进化的实际；由这般情形看来，大众语像是时代的产物，似乎不必反对，也不可反对。”

从“大众语”对于“国语”推广与发展的影响而言，胡适（1934a[1998]）曾如是断言：“我深信白话文学是必然能继长增高的发展的，我也深信白话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一天会比一天抬高的。”而事实也证明，国语和白话文在“大众语运动”中吸取养分，尤其白话文的发展挽救了当时普遍批评的那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的“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使其朝向通俗化与口语化发展，有利于推广与普及。

而在新马华人社会，这场“大众语运动”更直接促进了文学艺术的本土化进程；尤其是“南洋文学”或称“马来亚文艺”概念的形成，比如杨松年（2000：147-161）提出 1934 年开始为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马来亚地方性提倡的时期”，实则正是“大众语”概念中提倡语言“通俗化”在文学表现上的反映。

以下我们主要通过梳理 1930 年代“大众语”在新马华人社会中的宣传与发展，分析其深获新马知识界支持的社会背景中之“国语”教育与使用状况，进而探讨由“大众语”给新马社会“国语”推广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2 “大众语运动”在新马社会的宣传及其影响

关于“大众语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及其相应的各种论争，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与论述，近期较集中讨论的有薄守生（2014）、湛晓白（2018）、刁晏斌（2019）等。

中国“大众语运动”始于 1934 年，一方面是反对当时“复兴文言”的复古思潮，另一方面则批评国语和白话文。如其对国语和白话文的意见云：“以北平话强迫作标准，而要学这种‘京腔’，即在知识分子也是非常困难的”（叶籁士 1934[1949]），又云：“目前的白话语文只是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東西，还不是大众所需要的，……这种白话还不是大众的语言。”（陈子展 1934）

尽管“大众语”概念对当时实现语言统一和教育普及提出合理意见，然而其操作上缺乏现实性，就连核心概念也存在模糊性；乃至于有些过于偏激，如王理嘉（2003：32）云：

主张大众语的这一派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反对当时复古派提出的恢复文言，废纸白话的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受当时苏联马尔学派的影响，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国语（白话）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把它同普通的、大众的语言对立起来并大加反对。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偏激的。至于个别人提出以上海话作为大众的标准语，事实证明那是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的。

首先从“复兴文言”来看，实则 1930 年代中国社会的文言文仍对国语运动形成阻碍，如胡适（1929[1998]）的批评云：

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一个革命政府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岂不是连徐世昌傅岳芬的胆气都没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当时确实社会公函、报章、官方文件均仍普遍惯用文言，而 1930 年代的新马社会更是如此。至于当时白话文的缺陷，胡适（1934b[1998]）也毫不讳言地指出：

时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众化，只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大众的存在。因为他们心里眼里全没有大众，所以他们乱用文言的成语套语，滥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新名词；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语气是不文不白的；翻译是硬译，做文章是懒做。

另如瞿秋白（1932[1985]）则更偏激地指斥白话文的革命“是失败了，是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

然而整体而言，胡适对“大众语”的折中意见在当时很具代表性，即：认同“大众”与“通俗”原则的基础上，却不赞成其否定“国语”和“白话文”的偏激主张，且从根本上质疑其实践性，终而对其概念进行调和式诠释。其云：

自从一些作家提出了“大众语”的问题，常有朋友问我对这问题有什么意见。我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小意见：请大家先做点大众语的作品出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许多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不会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白话本来是大众的话，决没有不可以回到大众去的道理。……所以我说：大众语不是一个语言文字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提倡大众语的人，都应该先训练自己做一种最大多数人看得懂的文章。（胡适 1934b[1998]）

乃至曾经指责“大众语”为“虽然好像很激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的鲁迅，也认同其“大众”与“通俗”原则，且同样抱持调和观；如其 1934 年致信曹聚仁云：“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糊下去。”（鲁迅 1934[1996]）

虽然新马华人的社会思潮深受中国的影响，包括这里讨论的“大众语”，然而其开展因素或者宣传方式与影响程度都表现出特殊性；即如金丁（1938）对于“大众语”影响下推动新马文学界“通俗化”的发展，其云：“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展开，是有它的现实的根据。”

2.1 “大众语”开展时期的新马社会语言环境

邱克威（2020）对于新马社会的战前“国语”推广做了概括，并指出学校根据中国教育部实行“国语教授”的指示，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并征引 1949 年新加坡光华学校校长陈宗岳的总结称“国语变为侨校唯一的教学中介”。实则 1936 年南洋华侨教育考察专员就已指出“此地学校多以国语教授”（南洋商报 1936b）。

然而当时除了学校以外，整体社会语言环境仍表现出“国语运动”的不足；除了上述胡适对于公文报章多仍沿用文言，其实还存在鲁迅（1935[1996]）曾描述的这种社会语言现象，其云：

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口，听得懂。

新马社会也不例外，而且情况更为严重；其中问题包括学生离校就业所面临的职场仍是文言当道，而一般民众则通行方言，更甚者乃学校教员对于国语的生疏。

首先关于当时新马华人社会文言通行的现象，1936 年新加坡东华学校夜学部一则招生广告如是描绘：

最近该校审于我国商场中，一应文件，尚沿用文言文，而我国旧有之各项书籍，概属文言，凡浅涉白话文者，往往望洋兴叹，苦于学所非用。故该校最近增设国学专修科，除教授古文、四书、尺牘、古诗、史地外，并加授新闻学，凡关于新闻记者应具之常识与技能，莫不详细指授，以期养成新闻界之人才。同时各科均注重练习，并非呆读死书可比。该科主任一席，已延聘胡如威君充任。（南洋商报 1936a）

虽则文中称“我国”，但实际更是针对新马商场与职场现实，毕竟这种专修科是直接为当地培训职场人才的；尤其在“国学专修科”内设立“新闻学”，也更能看出当时报社的聘用标准，何况此前甚至有一位芙蓉的学生直接登报批评报纸用文言，其云：

我国近来出版物，都是用白话文了，这也是普及教育的利器，较之从前用文言文时，言文两歧，实在便利得多。但是我看许多报纸，仍旧用文言文，这真是不识时务了。报纸为灌输知识、开通社会的工具，应该要改用白话文，使到社会上的人，个个都看得出来，才有灌输知识、开通社会的可能。（杨火贵 1927）

可见进入 1930 年代的新马国语运动“全盛期”，这种社会公文与报刊沿用文言的风气还是没有多大变化。实则胡适继上述 1929 年的批评，在 1934 年也在《大公报》刊登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可见这一现象是共通的；只是新马社会估计更为守旧，乃至 1958 年的一篇社论仍称：

我在商界中，耳濡目染的商业信件，大多数是沿用着文言文，有的还写起古文言，及典故来。对于白话信，商界中的确很少见。……有一部分受旧教育的老前辈书记，就很看轻白话信，而且讨厌一切白话文。受现代教育的青年书记，为了适应环境起见，不得已也要随人写一些老句调，以迎合一般商人的意思。（英祖 1958）

更甚者，新马华文学校的传统“尺牘”教学虽则 1960 年代稍有调整，但直至 1970 年代后期两地教育机关才组织“华文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相继编订《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等。（参看卢绍昌 1998；莫顺宗 2001）

这种持久的守旧现象绝非偶然，即新马两地华文学校有其相对自主性，且需顾及现实环境因素，因此对于社会上国语未能通行的对策，与其加大改革力度，反而是采取顺应社会的对策；正如上述东华学校夜学部增设国学专修科的例子。这绝非个案，比如 1931 年当时堪称南洋学校最高学府的南洋华侨中学实行国文课程改革，其开篇总纲很具代表性，其云：“‘国文’一科，在南洋华校中，似乎为了表示不忘祖国，都不愿把它弃置或者把它轻视到属于应酬的或者敷衍的课程部分。”又云：“本纲要，系根据华中情形、南洋华侨社会需要、祖国课程标准，并参考国内各著名中学实施概况定的。”至于具体改革做法及其依据，则云：

可是事实上，在我国——教育政策不统一的中国，文言文尚保有相当的权威，有许多地方仍沿用着文言文。最显著的，新闻报纸上刊载的，还多为文言文，甚至于主笔先生们正以桐城姚家的国粹炫耀，更不必讲到官厅布告政府公文了。所以本课程纲要，便斟酌情形加了许多关于文言教材的规定。（承镜 1931）

这在 1931 年底提出，多少是有针对中国教育部规定小学国语教学一律教授白话文的政策，尤其是 1931 年初公布的“华侨中小学规程”明令：“华侨中小学出外国语外，一律以国语为教授用语，小学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南洋商报 1931）

此外，关于新马中小学国语和白话文教育，前述 1958 年的那一篇社论中还透露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其称商界书记除了学徒等外，“有的是中小学出身，大学生当书记的，我却未见过。……难怪老前辈的，说我们写白话信的为‘浅薄幼稚’。”（英祖 1958）这里提及书写白话信“浅薄幼稚”的包括中小学毕业生，实则通观 1930 年代以来的各方反应，新马两地中小学国语和白话文教育的整体效果确实欠佳。比如 1930 年一篇社论反应小学国语教育的问题，并举例云：

我以上所说的话，并非理想之谈，实在是从经验上来的。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子，以及亲戚朋友家中的小孩子，在学校中回来，假令他们照着课本，读几句白话文，或是学说几句国语，一定异常难听。如果不看着他们所读的书，保险可以教你听了一毫不懂。照这个样子，如果不想一彻底改良的办法，所谓白话，简直是“不成话”了。
（独鹤 1930）

这里除了国语仍未通行的社会环境，更重要还有学校国语教育的问题，尤其是师资素质，比如同为 1930 年的一篇社论称：

盖今日之社会，犹是年长者之势力也。除农工商各界未受国语训练者，姑不具论，即以教师而言，或则卒業较早，国音一科，未得其门而入；或于颁行字母时，即肄业于中等以上各校，虽曾稍加涉猎，然精妙所在，未能探讨。故于登坛执鞭口讲指画时，不误“丨马”为“秧”，将“英”、“迎”、“影”、“映”等字念为“丨ㄣ”者，已属凤毛麟角。发音之清浊，语调之变化，更无论矣。（为丨九 1930）

如此现象绝非个案，1933 年一位南来国语教师述及自身经验，称同校另一位国语老师时不时写一些字“考”他，云“这个字给你猜猜看是什么字”，实则是那位老师自己不会读；当其伎俩被识破，作者“问道：‘你为什么不去查字典呢？’他说：‘我国音字母也不懂哩，查到了仍然不懂得读。’”（钢盾 1933）这虽是极端事例，但也反映当时学校国语教育的一些弊端。

除了师资，还有指责教材文选的偏误，致使学生模仿的结果即：“初中学生多读白话文的，写出来的文章也学了那佶屈聱牙的译文，形容月光会从水银一直写到霓虹灯，形容走路会从柳枝的摇摆一直写到烧香老婆了。”（周寒梅 1936）乃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写作水平，如云：

有一班青年对于中文文法尚且弄不清楚，只是为了文章发表欲太盛，就夹七夹八的胡乱凑成，以为在报章副刊上刊登了自己的文章是怎么出风头的一回事，经人好心的指摘后，又不肯虚心接纳，甚或还觉得这是被人侮辱了似的难过。……更有一班浅薄的青年，写出的东西就跟小學生的日记差不多，照理只好编入“儿童周刊”里面，但为了要挂起“编辑”衔头去吓人，就三三二二的凑合多少钱办起什么“文艺杂志”来了。（阿凡 1936）

这一系列学校国语教育的问题，就造成了 1930 年代由中国总领事主持的新马华文学校历届会考中，国语成绩都始终低落，及格人数偏低；情况与南洋华侨中学入学会考类似。于是 1937 年社会上提出了“国语能力分组制”的教学改革建议，其云：

中学的入学试验，每以其英算尚过得去，国语就是差些，也准其试读。他们在小学既没有树立很好的国语基础，一旦授以中学国语读本，则一知半解的混下去，终至不可救药。……惟眼前一部分小学国语程度之低劣，中学国语程度之参差不齐，已成为不

可讳言的事实。欲图补救，除改革上述诸弊端外，应采用国语科能力分组制度。（鸿铨 1937）

这里明言“眼前一部分小学国语程度之低劣，中学国语程度之参差不齐，已成为不可讳言的事实”，可见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除了学校国语教育和白话文写作上的问题，社会用语情况也存在不利于国语发展的现象。这一点上述商界与职场多用文言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便是一般民众仍通行方言。这在下文讨论“大众语”宣传中许多人指出一般民众“不懂国语”，以及“通俗演讲”中多用方言的事例中即可见一斑。此外还有关于 1936 年中国政府颁布电影一律采用国语条例后，评论指出：“现时国语声片，仅占此间公演国片之二十巴仙，而此二十巴仙，亦须极努力，方能达到。有谓如禁摄制粤语片，则马来亚放映国产声片之戏院，势时受大打击。”（南洋商报 1936d）

以上从社会用语之沿用文言，以及一般民众之通行方言，加上学校国语教育的一些弊端，首先铺陈 1930 年代“国语”在新马社会推广与使用的背景，由此则能理解“大众语”一方面批评“国语”弊端，另一方面反对文言的立场，何以能获得众多文化人的支持。

2.2 新马关于“大众语”的论争与宣传

“大众语”在新马社会紧随着中国国内的步伐开展，在 1934 年就有不少支持“大众语”的文章出现，比如司徒无咎（1934）批评当时“常见有些所谓普罗作家描写人力车夫的生活，却说出这样的话来：‘由大坡拉到小坡，只给一角钱，资本制度不推翻，人们的生活怎么会改善？’这是人力车夫的话呢？还是作者自己的话？”并总结云：

要写好文章，先得去学各种人的各式各样的话，最低限度，要会说流畅的话，表情达意，才不至晦涩难明。否则像前几年盛行一时的欧化白话文，那简直是新古董、洋古董，比读起昭明文选来还令人加倍不懂！

这里提的仍属于胡适所称“不是一个语言文字的问题，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但毕竟还是批评了“欧化白话文”，并且提出“通俗”原则。无论如何，“大众语”在新马迅速获得普遍支持，乃至 1935 年初吉隆坡的杜残（1935）批评“大众语”还战战兢兢地自嘲：“有人说，反对大众语的，是思想落伍，顽固守旧，不知道社会进化的实际。”他随后指出“大众语”的一系列问题，其核心与胡适“请大家先做点大众语的作品出来，给我们看看”的意见相同，云：

大众语这新娘子的面目，大家总想认识认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揭开它的面罩，究竟它的尊容有无长着麻子？是否白皙？抑是黧黑？大家无从知道。（杜残 1935）

此外还有同时期新加坡的太山（1935）也指出了“大众语”概念的一个关键误区，其云：

大众语未必就能大众化，原因是大众不识字者居多，任你写得什么语都不会看。即用罗马拼音子，亦不能普遍，理由是各地方言不同。

实则更重要的是，上述杜残（1935）文章中指出“有人提出建设南洋大众语文”，并在批评“南洋大众语”概念时列举了一些例子，其云：

大众语是尽量吸收俗语，如最近有人举出南洋的大众语词如罗帝、三问、更头等，和非大众语词的通知、传票、警长等对立。……关于尽量吸收通俗的土语，如以更头代替警长，甲夏拉代替工头等，我反对的理由是：这种新语词是否也适用于非南洋的大众，而成为全国的大众语？

其中“南洋大众语”词汇如“罗帝”乃英语 notice 的音译、“三问”则是马来语 saman 的音译、“更头”则是粤语“警头”的译写；另外“甲夏拉”则是马来语 kapala 的音译，kapala 本义为“头”，新马民间至今仍以之表示“工头”。这种方言、英语、马来语混杂的“华语”，正符合新马华人的语言实际，即邱克威（2020）所谓“早期白话夹杂方言与外语式的文体”。

另外，目前所见当时文献上记录的“南洋大众语”讨论及其词汇，另如绿琳（1938）云：

什么是南洋的大众语，结果，发现不少自己认为南洋大众语的，比如马来语中的“打限”、“阿古”，红毛话中的“气罗”、“哀谢”，我都认为是南洋的大众语。然而忽然想起不久之前有位先生的，有篇什么一个副刊上发表，认为这里的侨生人等满口“气罗”、“哀谢”，是一种“奴性”，立刻心冷半截了。

这里提的“打限”为马来语 tahan，意即忍耐；“阿古”为 aku，是第一人称代词。至于英语的两个词则未能确定。这里也可看出，当时社会上对于“南洋大众语”的概念存在着较大分歧。

整体而言，纯粹针对“大众语”的论争并不热烈；继 1935 年的一二反对声音，1936 年初也仍零星见到对“大众语”的批评，如君侠 2 月份的文章实则仅是笼统的评论，其云：“所谓提高南洋文化的水准，并不是如此的简单，也不是这样的容易，喊喊、叫叫、骂骂、跳跳，说高就高，说大众化就大众化。”（君侠 1936a）又云：“总而言之，歪曲‘大众’，失了‘理论’中心而不自知的人，真是瞎眼鸡想抓活虫吃，徒然白费心肠罢了。”（君侠 1936b）因此严格来说，君侠的批评更多是对于当时“文坛的形成敌对”感到厌恶。

另一方面，正是这股“南洋大众语”的呼声而促进了“南洋文学”的讨论与发展，较早如提倡“南洋文学”的主要人物之一陈炼青在 1935 年底发表《关于南洋色彩的文艺》，文中虽然主要讨论题材与技巧问题，并未直接谈及“大众语”，但将其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中，实则无法排除其影响。而同时期周起凤（1936）则直接触及文学的语言形式，其云：

因此，我们承认，要话剧能深入到民间去，要话剧能成为一种唤醒民众的工具，就得采用该地方的方言去做才行。虽然一个国家不应该存有好多种方言，使一国家语言永远得不到统一，但在目前，当语言从分歧达到统一的过渡时期里，以负有唤醒民众的使命的话剧，除了采用方言，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办法。

这种“大众语”为应急的“过渡”措施，在新马华人社会的“大众语”宣传中堪称为主流观点，尤其进入到 1937 年开始支援中国抗战的时期更是如此；于是文学艺术界积极提倡不仅在内容题材上要求“南洋大众化”，而且语言形式上也要求符合南洋大众的“通俗化”，乃至“方言化”，并进而提倡“方言文学”。比如当时一篇社论对方言“过渡”到国语的操作，提出：

要方言通俗化，在起首一种方言，只有行之一地，然后渐渐的灭掉借用的字，像闽南音的“牙”字，改写为“的”，“乎”字写为“给”字，唯要创作有人注意，当慢慢的减少，而至无形消灭，给大家在不觉里跑上国语化的途径。（南洋商报 1939a）

另外，进入到支援抗战时期，“大众语”更获得了普遍支持，从积极一面看是压倒了“复兴文言”的声音，然而却使它在反对“国语”的立场上走向偏激，尤其当“大众语”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相结合之后。于是这时期关于“‘国语’以一地方言强迫语言统一”的论调是相当流行的，如一篇代表“柔佛新文字研究会”的社论云：

我们明白了上面的两点，便知道：新文字并不是破坏统一，不过它不主张：以一个地方的语言作为全国的标准，削足适履地强迫全国大众抛弃自己从小就说着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父母语，去学习不知从何处来的所谓标准语。其实我们想以国语去统一全国的语言，过去的事实已证明了是幻想。新文字并不是反对语言统一，而是反对

这种侵略式、独裁式的办法，反对这种用园丁拿着剪草机剪草的手段来统一全国的“国语运动”。（徐新一 1939）

此外另一篇则看似温和，云：“文字的改革绝不能固执一个地方言为主导，应该从各地主要的方言区而推动达到统一的国语。”（白波 1939a）实际上这时期“大众语”论者经常如此偷换“国语”概念，如 1938 年报章上专辟一栏“南洋的通俗文学专号”中，绿琳（1938）为其此前提出“方言文学的‘国语化’”受到批评而辩解云：

这毛病，也正是现在一般人认为应该纠正的，那就是我们“国语”，现在说来就是“北平话”，所谓方言文学的“国语化”，当然即是“北平话化”了。但我的原意却并不是这样的，为怕引起读者误会，也曾特别在那“国语化”后面，用括弧括了一些注解：“（普通化、普遍化，非北平话化。）”

相较于战前较为零星的“大众语”讨论，抗战时期在文学艺术领域关于“通俗化”，乃至“方言文学”的争论则更为热烈，尤其是由此延伸形成的关于“南洋文学”概念的争论；此外还有由于“新文字运动”介入于“大众语”宣传之中，使得讨论范围扩大了。于是这时期的“大众语”问题往往转化成为文学艺术与新文字的问题展开宣传与讨论。

首先是文学领域，杨松年（2000：147-161）对于 1930 年代“马来亚地方性的提倡时期”已经做过相当细致的讨论，包括当时参与各方的意见与论辩；但由于未涉及“大众语运动”的影响，因此其论述主要侧重于题材与技巧。

实则 1937 年以来新马华人社会为了利用文艺方式宣传抗战，纷纷掀起文学、戏剧、歌咏等艺术形式的“大众化”与“通俗化”运动；而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大众化”问题正是其共同的旗帜。正如当时总结“话剧运动”的实践经验，云：

第一个问题便是语言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必须以口头话大众化，尤其以南洋的实际情形商酌，视观众的语言水准高低而定台词音调，甚至以方言对白也无妨的。因为我们的戏剧是想使观众明白易懂，从而达到实际的教育目标。果如这样，我们的戏剧便得成功了。（文翔 1937）

这种提倡以“方言”创作的主张，越是进入宣传抗战时期则语调越是坚定，如云：

方言的文学，要怎样才会通俗化，还要我们向大众学习，发掘大众的本质的特点，吸收那些比较通俗的，大众能接受的，凡是大众听得懂，南方的可以、北方的可以，连马来话、英国话都无不可，总要适合广大群众的需求，以加强抗战和民族意识为前提。（南洋商报 1939a）

同时也正是“大众化”与“通俗化”的讨论，尤其面向新马社会中多数不识字的“广大群众”，“新文字”便进入了讨论范围。王理嘉（2003：45）对于“大众语”和“新文字”的关系做过概括，其云：

1933 年，上海的一些语文刊物把拉丁化新文字介绍给大家，立刻引起广泛的兴趣，因为当时上海文化界为了反击提倡文言、读经，反对白话的复古运动，正在开展一场大众语的讨论。不少人认为，只有实行新文字，大众语的问题才能正确解决。……于是，大众语运动和拉丁化运动很自然地合流了。

此外湛晓白（2018）也指出：“大众语论战是拉丁化由苏联转向本土的关键环节。”

至于新马社会则从 1937 年起，便积极地公开讨论“新文字”问题，尤其是借由“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获得普遍支持。此外，或许当时普遍对于“文艺通俗化”的论争主要集中于题材与技

巧，因此对于“新文字”的争辩不多见；只是从目前记录来看，不论是教育界或是文化界，支持并响应“新文字运动”的人相当多。其中包括报章专设“新文字专页”，定期刊登新文字的宣传文章，甚至于报章编辑也公开支持“新文字”，并主张“新文字运动”与“通俗文学运动”相结合，其云：

通俗文学运动和新文字运动，在马华新启蒙运动中，是两种不同的阵容，然在工作的意义上，却是统一的，互相联系的。新文字如果推行得普遍，通俗文学运动就可以解除“汉字”的桎梏，获得更顺利的进展。不过，我们并不是主张立刻打到汉字，汉字在现阶段还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改良它，使它和大众的语言取得一致。总之，新文字要“把文字交给一切人”，通俗文学要“把文学交给一切人”，这两种运动是“殊途同归”的。（编者 1939）

“新文字运动”在新马社会的宣传与普及确实超乎想象，比如当时成立了一个“柔佛新文字研究会”，乃至最晚于 1941 年还形成了一个遍布新加坡、吉隆坡、柔佛的“新文字”同好团体，且刊登《一封公开征友的信》，云：

我等都是对新文字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爱好的人。爱好它的原因，自然很多，然而，我们真正爱它的原因，还是为了它积极的使命——解放中国的文盲大众。（南洋商报 1941）

此外邱克威（2017）还曾指出拉丁化新文字在“一九三三年马来亚中等学校有编入课程代替注音符号者”。可见新文字在 1930 年代新马知识界的传习远早于报章上所见的公开宣传。

当然，“新文字运动”本身既包含了替代汉字的因素，社会上的反对声音肯定是有的。然而一则如上所述是淹没于“通俗文学运动”更大的议题讨论中，二则也是新文字论者并未偏激主张替代汉字。因此并未形成激烈的论争。比如在“歌咏运动”中提及：

在拉丁化的方言文字和方言歌咏运动中，反对派曾拿过他们似是而非的谬论，他们说这会破坏文字统一和言语统一的运动。但是我们知道学习方块字不是短促时间可以成功。为了适应目前抗战建国的伟业，方言文字和歌咏都是很需要的。何况我们并没有因为推广方言的文字和歌咏，就放弃了文字统一和言语统一的工作。相反的，对于统一文字言语的工作更有助益。（力谦 1940）

然而我们结合当时“通俗化”运动开展的一些案例也能看出社会一般对“新文字运动”的反对态度，比如 1939 年一篇总结马六甲通俗文学运动的报告中，归纳的三条特点之一即明言：“没有利用新文字拉丁化，去作通俗化的辅助。”（夏殷 1939）

可见整个 1930 年代，“大众语”概念借由“通俗文学运动”与“新文字运动”在新马华人社会取得了更广泛的宣传，也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支持，并以“大众化”与“通俗化”为其共同旗帜与口号。比如白波（1939b）称：“新文字是适合大众的口语。……它是能够由地域的方言上，转为书面化，使大众的真心话表现得出来。”又夏光（1941）称：“今天我们要切实的纪念‘五四’，要真正的负起推动新文化的任务，我们以为在大众化、通俗化这工作，我们是应特别努力的。因此发展方言文学，组织文艺通讯运动，可说是这方面的具体工作。”

2.3 “大众语”对当时华人社会语言的影响

“大众语”在新马华人社会尤其在抗战期间与“通俗文学运动”和“新文字运动”相结合，关键是在社会语言的大众化与通俗化原则上获得了普遍认同，并直接影响于新马华人社会的语言

使用情况。在当时而言，除了上述“方言文学”、“方言戏剧”、“方言歌曲”等，实则更为直接的反映则是“通俗演讲”。新马社会支援抗战时期，各地方经常举办“通俗演讲”，除了宣传“抗战救亡”，还负有筹款的任务。这是支援抗战非常重要的宣传与筹款方式。因此吴柳斯（1938）称：

“通俗演讲”，他在马华“抗战救亡”运动过程中，实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宣传生力军。这是谁都不可否认的。

而在当时面向大众的演讲，依据大众化与通俗化的原则，即说“广大群众”听得懂的话，于是各地多以方言演讲，乃至于一场“通俗演讲”根据当地群众的方言背景使用多种方言，比如1939年吉兰丹的一场筹赈会通俗演讲，演讲人及其讲题与用语情形如下：

二、《中国抗战必胜之铁证》，马奇杰先生闽南语；三、《如何对国家尽忠、民族尽孝》，林晓东先生琼语；四、《最近的抗战局势》，金寿浩先生闽南语；五、《广田外交之阴谋与野心》，吴启祥先生粤语；五、《敌国维新之动机及其侵华之步骤》，徐知经先生国语。（南洋商报 1939d）

再如同年马六甲的筹赈会通俗演讲，“首为陈宗岳君用粤语讲述推行一元还债运动，次为李晓山君用闽语讲述出钱出力，郑君平用潮语讲述推行节约运动。”（南洋商报 1939b）此外新加坡同年的一场通俗演讲，举办方明确提到：“因为场中占有多少的广府侨胞的缘故，我们就选出郑好女士，用粤语演讲。”（落晖 1939）

这种通俗演讲的听众通常都很多，动辄如新加坡旧跑马场的演讲会场“听者有万人以上”（南洋商报 1939c），又如新加坡闽南人群体在1938年下半年“尤以数月来经常闽侨闻人举行通俗演讲，所收效果，最为可观，每次演会举行，听者逾万，少亦数千”（南洋商报 1938）；有时连非华人也来凑热闹，比如新加坡的一场演讲，“场中除我国侨众之外，还有不少的马来朋友津津有味地看台上的演出。”（落晖 1939）对于抗战筹赈会而言，通俗演讲是非常好的宣传与筹款方式；而如此佳绩的主要因素，正是赖于“大众语”主张的“通俗化”，使用“大众听得懂”的方言。

因此虽然1930年代初期，尤其经由柯达文与中国总领事馆的极力配合，新马社会“国语”的推广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甚至连一般华人方言帮群社团也开始响应“国语”，比如1936年潮州群体为主的新加坡端蒙校友会议决，“本会对于集会议事或举行一切对内对外仪式会，全体概用国语，禁用潮州方言”（南洋商报 1936c）。这相较于1930年代初围绕着学校展开的“国语”发展，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然而紧接而来的“抗战救亡”运动，哪怕是“国语运动”支持者也不得不认同以方言开展抗战宣传是当下最有效的方式。这无疑是新马“国语运动”在1930年代的一次必要的妥协。

其次“大众语”影响于新马华人社会中白话文的书写，尤其是文学创作上的，这在上文已经做了不少论述。尤其在“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宣传下，乃至于提倡“方言文学”与“南洋大众语”，即所谓“吸收那些比较通俗的，大众能接受的，凡是大众听得懂，南方的可以、北方的可以，连马来话、英国话都无不可”（南洋商报 1939a）。

首先，我们且不论所谓“南洋文学”的论争，单就语言问题来看，“大众语”的宣传确实对于当时写作白话文的用词与结构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排斥“不中不西”、“不文不白”的那种“佶屈聱牙”的白话文。比如1937年一篇社论提出：“平时阅读书报，那些文章多数是语体文，随时会遇见一些文言的字眼和语句，觉得很不舒服，仿佛看见眉清目秀的面孔上长了个疙瘩。”至于其主张的“纯粹的语体文”标准，则云：

区别语体和文言固然可以从逐个词句入手，但是重要的办法还在把握住一个标准。那标准简单得很，就是“上口不上口”。凡是上口的，语言中间通行这么说的词句，那可以写进语体文，都不至于破坏语体文的纯粹。如果是不上口的，语言中间不通行这么说的词句，那大概是文言的传统，只是能用在文言中间，或者是文言传统里的错误的新产品，连文言中间也不适用。（圣 1937）

不可否认，作者在判断“纯粹”语体文时的标准不尽合理，比如其云：“因为语言中间不通行‘上学时’、‘放假时’等等，非把‘时’字写做复音节语‘时候’不可。因为语言中间没有‘以 xx 为 xx’这种说法，非另外找一个口头的通行说法不可。想到了一个‘缅怀’，一个‘进而’，当然也放弃不用了。”此外还提出：“像‘凝眸于栏外的篱笆’，就是我所说的文言传统里的错误的错误的新产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上口不上口”的简单标准，确实在当时对于应付那种“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还是有效的。且不论“欧化”与否，通观 1930 年代新马地区的白话文确实充斥着“不文不白”的用词与句式。

另外，往更大范围的文学创作而言，目前文献上并未录存太多关于“南洋大众语”的讨论和应用；哪怕是“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中主张的“方言文学”也如上述多看作是抗战时期适合大众宣传的应急措施与必要措施。比如金丁（1939）所总结的：

由于祖国抗战形势的进展，马华救亡活动的普遍深入，为要加强广大侨胞对于抗战建国的认识，提高他们对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使文艺作品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所理解，南洋文艺通俗化的提出，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整体而言，当时关于“南洋文学”概念的讨论多着重于意识形态与题材技巧，很少直接触及语言问题。然而“通俗化”下提出的“南洋大众语”概念，确实持续发酵于文艺界并且表现于经历过那段“大众语运动”时期的作家作品中，其中苗秀正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苗秀 1920 年出生于新加坡，17 岁便投稿《星洲日报》副刊等并深得主编郁达夫的赏识。苗秀在 1930 年代便积极投入“南洋文学”的讨论，且在当时就“主张用闽粤方言演出”戏剧，而且他本身就是“马华文坛粤方言文学写作的实践者”（朱崇科 2019）。如其代表作《新加坡屋顶下》中符合于“南洋大众语”的语言表现不少，尤其在人物对话中，举例如：

哎呀，你个咸家铲，扭得人咁痛！人家都係有妈生啲！

老娘唔苏格，你又奈乜我何！

其中纯是粤语词汇与句式，而“苏格”一词则是马来语 *suka* 一词的粤方言音译，意即喜欢；这确实属于那个时期大众化的语言。

最后，新马社会“大众语”所产生的影响还表现在“新文字运动”的宣传与推广。上文述及新马社会 1930 年代对“新文字”的接受与支持超乎想象，不论从其讨论之深度与群众之广度都非同一般。实则邱克威（2017）曾分析陈初荣的《现代华语拼音》及其相关著作，称：

由于他受到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方言化”、“大众口语化”主张的影响，废弃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给他根据自己口语语音特征进行描写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而其制定拼音方式以及具体字音上确实也多处反映出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语音系统的特征。

陈初荣出生于 1916 年，自 1937 年考入吉隆坡加影华侨中学，老师教授的拉丁化新文字给他的冲击，从此未停止钻研，并在 1940 年初步完成其《华语拼音》，直至 1983 年出版其最后著作《现代华语拼音字典》，前后近 50 年全靠业余自学坚持不懈。

邱克威（2017）称：“陈初荣对于‘现代华语拼音’文字方案取代汉字的立场是从不讳言的。”同时引述陈初荣自己的话云：

新文字的语音组织，同样的采用国际公用的拼音字母，灌以华语语音，写成华文，与世界各国的拼音语文，大有不同之处。因此他日后若能获得海内外华族一致的爱护，而成为华族通用的文字，则应称之为新拼音华文，或现代化华文（The Modern Chinese）。

这显然正是新马“南洋大众语”的拼音“新文字”方案；其中对语音系统的描写包括平卷舌不分、保留入声等，确实是一般民众口中的新马华语发音特点。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陈初荣一个人完成了 1930 年代新马社会中“大众语运动”下“拉丁化新文字”支持者所追求的目标。

上述“大众语”及其相关运动宣传下所产生的社会语言方面的影响，实则都从不同层面突显出新马华语自身的独特要素，即方言与外语相混杂的语言形式，包括词汇、句式、发音。所以，或许可以说，1930 年代新马华人社会掀开的“大众语运动”，虽然也有促使“国语”更大众化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使得新马大众语言中的混杂性特点得以突显，由此造成新马的“国语”乃至后来的华语保留了较多地域特征。

3 结语

新马华人社会的“大众语”，乃至同时的“通俗文学运动”、“新文字运动”，毫无疑问是紧随中国国内关于社会语言改革的思潮而展开的。然而，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马华人社会语言与文化环境有其特殊性，其“大众语”及其相关运动的开展自然也有其自身规律与特征。实则早在 1938 年金丁（1938）就已极力强调新马“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特殊性，否认“‘大众化’、‘通俗化’口号”与“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是“从国内搬来”，其云：

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展开，并不是没有它现实的根据的，不是什么少数人有注意从国内搬来。

而上述分析 1930 年代新马华人社会“国语”教育与使用的大背景中，也能看出新马华文学校国文教育为了适应商界通行文言文的职场现实而强调文言教学，以及抗战期间为了有效宣传而提倡方言演讲、方言文学、方言歌曲、方言戏剧等；这都显示出新马华人社会在 1930 年代的语言环境是极度复杂的，而且“国语”的推广实际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于是在文化界与知识界普遍接受“大众语”及其相关运动的同时，尤其是对大众口语用词与句式的调适，所谓“南洋大众语”的要素难免扩大其活动面，新马社会“国语”的地域特征也由此得以将根扎得更深。这或许也是新马华语在数十年的“国语运动”冲击下仍保持其独特特点的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大众语”的宣传对于“国语”的发展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上文提及的有效遏止那种“不中不西”、“不文不白”的白话文，而积极强调体现口语实际的白话文；虽然“上口不上口”难免为过于刻板的标准，但却有效地使得“国语”更为大众化，有利于其推广与普及。

至于“大众语”，由于其自身概念与性质的模糊性，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正如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请大家先做点大众语的作品出来，给我们看看”，亦即本地论者之所谓“大众语这新娘子的面目”。实则关于这一点，鲁迅（1935[1996]）说得更为彻底，其云：

“人”就是 Rhen，“房子”就是 Fangz，“我吃果子”是 Wochgoz，“他是工人”是 Tashgungrhen。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

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因此所谓“大众语”虽则存在其实践上的致命弊端，但其提倡“大众化”、“通俗化”却影响深远，尤其对于促使白话文更为口语化，避免佶屈聱牙的“新式白话”，是有积极作用的。

最后，正如前述新马语言社会有其特殊性，其中尤其文言文的论争，竟在二战后又一次“死灰复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未死之灰复燃。比如1950年代关于学校国文教材的文言文及其教学展开多番的讨论；在社会公文方面，上文举过1958年一篇社论提及“我在商界中，耳濡目染的商业信件，大多数是沿用着文言文”（南洋商报1958），实则早在1949年10月份一篇社论就已提及“在公文方面，我们始终因袭旧形式”，更关键的是文中以中国公文进行比较，云：

中共的新政府成立到现在不过两星期，可是在简化公文这方面已经有所表现。外交部长周恩来于双十节那天给巴黎的使馆的复电，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心里想什么，嘴里说什么，这够诚意。上司很亲密地称呼你我，不摆出长官的臭架子，这够平等。信里没有“戴罪图功”、“尚无不可”那些陈辞烂语，简单明了，这更增加文字的力量。

这虽然仅仅是国语和白话文发展的一个侧面，但仍很具体地表现出新马两地和中国国内由于社会语言与文化环境的不同，致使各自在国语和白话文发展上的不同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 A Fan(阿凡). 1936. 谈谈马来亚文坛(Tantan Malaiya went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6月3日.
- Bai Bo(白波). 1939a. 拼音文字(Pinyin wenz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月12日.
- Bai Bo(白波). 1939b. 谈谈新文字(Tantan xinwenz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15日.
- Bian Zhe(编者). 1939. 新文字运动与通俗文学运动(Xinwenzi yundong yu tongsu wenxue yundong).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1日.
- Bo Shousheng(薄守生). 2014. 语言学史视域中的30年代大众语运动(Yuyanxue shi shiyu zhong de 30 niandai dazhongyu yundong), 《文艺争鸣》(Wenyi zhengming), Vol.2, P70-79.
- Chen Xuefeng(陈雪峰). 2008. 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中小学的读经运动(Chen Jitang zhu yue shiqi Guangdong zhongxiaoxue de dujing yundong), 《岭南文史》(Lingnan wenshi) Vol.3, P97-102.
- Chen Zizhan(陈子展). 1934. 文言-白话-大众语(Wenyan-Baihua-Dazhongyu). Shanghai(上海): 《申报》(Shun Pao), 6月18日.
- Cheng Jing(承镜). 1931. 写在“华中国文科教学纲要”之前(Xie zai ‘Huazhong Guowenke jiaoxue gangyao’ zhi qi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0月3日.
- Diao Yanbin(刁晏斌). 2019. 百年书面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历史、现实与反思——为纪念现代汉语一百周年而作(Centenary written Chinese and modernization mov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reality and reflection - to commemo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modern Chinese),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hua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20 No.1, P1-13.
- Du Can(杜残). 1935. 什么是大众语(Shenme shi dazhongyu).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2月22日.

- Feng Xin(风心). 1935. “吃古不化”与“吃今不化”(‘chi gu buhua’ yu ‘chi jin buhua’).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16日.
- Gang Dun(钢盾). 1933. 咖喱(Gal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1月1日.
- Hong Keng(鸿铿). 1937. 提高华校国语程度采用国语能力分组制问题(Tigao huaxiao Guoyu chengdu caiyong Guoyu nengli fenzuzhi went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2月26日.
- Hu Liutao(胡流涛). 1935. “复古运动”与“超脱”文学论透视(‘Fugu yundong’ yu ‘chaotuo’ wenxuelun toush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1日.
- Hu Shi(胡适). 1929[1998].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Xinwenhua yundong yu guomindang), 《胡适文集(5)》(Hushi wenji, 5), P587-588, Beijing(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Hu Shi(胡适). 1934a[1998].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Suowei zhongxiaoxue wenyan yundong), 《胡适文集(5)》(Hushi wenji, 5), P433-434, Beijing(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Hu Shi(胡适). 1934b[1998]. 大众语在那儿(Dazhongyu zai nar), 《胡适文集(5)》(Hushi wenji, 5), P444-445, Beijing(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Jin Ding(金丁). 1938. 对于南洋的文艺通俗化运动应有的几个基本认识(Duiyu Nanyang de wenyi tongsuhua yundong yingyou de jige jiben rensh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28日.
- Jin Ding(金丁). 1939. 现阶段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检讨(Xianjieduan Nanyang wenyi tongsuhua yundong de jianta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9日.
- Jun Xia(君侠). 1936a. 何必咪咪叫(Hebi mimi jia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2月18日.
- Jun Xia(君侠). 1936b. 如此的“大众”与理论(Ruci de ‘dazhong’ yu lilu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2月27日.
- Khoo Kiak Uei(邱克威). 2017. 陈初荣《现代华语拼音》的拼音方案及其音系特征: 记现代汉语拼音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方案(Romanization Design and Phonetic Features of Tan Chor Eng’s Modern Chinese Pinyin: A Unique Romanized Design of th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Journal of world confederation of institutes and libraries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ies) Vol.5, P44-73.
- Khoo Kiak Uei(邱克威). 2020. 二战前“国语运动”在新马社会的开展与普及(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Guoyu Movement in Pre-war Singapore and Malaysia), *Global Mandarin* vol 6 issue 1, P115-135
- Li Qian(力谦). 1940. 关于方言歌曲(Guanyu fangyan gequ).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月19日.
- Li Wo(梨渦). 1935a. 胡流涛谬论的批判(Hu Liutao miulun de pip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5日.
- Li Wo(梨渦). 1935b. 再和水源君“论古谈今”(Zai he Shuiyuan jun ‘lungutanji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14日.
- Liang(力 | 九). 1930. 推行国语必须“自己会用”(Tuixing Guoyu bixu ‘ziji huiyong’).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7月30日.
- Liu(留). 1933. 方言(Fangy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20日.
- Lu lin(绿琳). 1938. 关于方言文学的“国语化”(Guanyu fangyan wenxue de ‘guoyuhua’).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22日.
- Lu Shaochang(卢绍昌). 1998. 新加坡的推广华语运动(Xinjiapo de tuiguang Huayu yundong). 《语言文字应用》(Yuyan wenzi yingyong), Vol. 3, P3-5.
- Lu Xun(鲁迅). 1934[1996]. 答曹聚仁先生信(Da Cao Juren xiansheng xin), 《鲁迅全集(6)》(Lu Xun quanji, 6), P76-78, Beijing(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
- Lu Xun(鲁迅). 1935[1996]. 门外文谈(Menwai wentan), 《鲁迅全集(6)》(Lu Xun quanji, 6), P101-102, Beijing(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

- Luo Qingyun, Dai Hongxian(罗庆云、戴红贤). 2013. 民国教育家汪懋祖文言文教育思想研究——以1934年有关文言文教育争论为中心(Minguo jiaoyujia Wang Maozu wenyanwen jiaoyu sixiang yanjiu - yi 1934 nian youguan wenyanwen jiaoyu zhenglun wei zhongxin), 《武汉大学学报》(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Vol.66 No.1, P103-108.
- Luo Hui(落晖). 1939c. 在几里年律的一个通俗演讲会(Zai Jilinianlv de yige tongsuyanjianghu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7月22日.
- Mo Shunzong(莫顺宗). 2001. 李延年: 从商人到华团领袖(Li Yannian: cong shangren dao huatuan lingxiu), 林水椽编《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中的精英企业家》(Lin Shuihao ed. Malaiyiya huaren lishi zhong de jingying qiyejia), P203-237, Taipei(台北): 中央研究院(Zhongyang yanjiu yuan).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1. 教育部公布华侨中小学规程(Jiaoyubu gongbu huaqiao zhongxiaoxue guicheng).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2月2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6a. 本坡东华学校夜学部增设国学专修科(Benpo Donghua xuexiao yexuebu zengshe guoxue zhuanxiuke).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7月14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6b. 华教考察专员方蔚君访本报(Huajiao kaocha zhuan yuan Fangwei jun fang benba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0月4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6c. 端蒙校友会今后开会拟用国语(Duanmeng xiaoyouhui jinhou kaihui niyong Guoyu).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21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6d. 南洋国语教育日渐普遍, 放映国语声片乃顺水推舟(Nanyang Guoyu jiaoyu rijian pubian, fangying Guoyu shengpian nai shunshuituizhou).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28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8. 一年来闽帮筹赈概况(Yinian lai minbang chouzhen gaikuang).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31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9a. 为方言的文学说几句话(Wei fangyan de wenxue shuo jijuhua).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2月6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9b. 甲华筹赈会通俗演讲(Jiahua chouzhenhui tongsuyanjiang).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3月22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9c. 通俗演讲在旧跑马场, 中印人士多往听(Tongsuyanjiang zai jiu paomachang, Zhong Yin renshi duo wang ting).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6月29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9d. 吉兰丹筹赈会通俗演讲(Jilandan chouzhenhui tongsuyanjiang).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17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41. 一封公开征友的信(Yifeng gongkai zhengyou de xi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14日.
- Qu Qiubai(瞿秋白). 1932[1985].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Puluo dazhong wenyi de xianshi wenti), 《瞿秋白文集(文学篇)》(Qu Qiubai wenji, wenxuebian), P469-470, Beijing(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
- Sheng(圣). 1937. 语体文要写得纯粹(Yutiwen yao xiede chuncu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2月23日.
- Shui Yuan(水源). 1935. 梨涡君“论古谈今”谬论的检讨(Liwo jun ‘lungutanjin’ de jianta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19日.
- Situ Wujiu(司徒无咎). 1934. 学作文先要学说话(Xue zuowen xian yao xue shuohua).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8日.
- Tai Shan(太山). 1935. 大众语的模范者(Dazhongyu de mofanzhe).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月17日.
- Wang Lijia(王理嘉). 2003. 《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Hanyu pinyin yundong yu hanminzu biaozhunyu), Beijing(北京): 语文出版社(Yuwen chubanshe).

- Wen Xiang(文翔). 1937. 从实践中迈进——对于业余话剧运动的一点意见(Cong shijian zhong maijin - duiyu yeyu huaju yundong de yidian yiji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3月13日.
- Xia Guang(夏光). 1939. 纪念“五四”与推进马华新文化(Jinian ‘wusi’ yu tuijin mahua xinwenhua).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3日.
- Xia Yin(夏殷). 1939. 马六甲通俗文学运动的检讨(Maliujia tongsu wenxue yundong de jianta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16日.
- Xu Xinyi(徐新一). 1939. 中华民族统一语(Zhonghua minzu tongyiyu).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10日.
- Yang Huogui(杨火贵). 1927. 与友人论报纸宜改用白话信(Yu youren lun baozhi yi gaiyong baihua xi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2日.
- Yeo Song Nian(杨松年). 2000. 《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Xinma huawen xiandai wenxueshi chubian), Singapore(新加坡): BPL 教育出版社(BPL Education Press).
- Ye Laishi(叶籁士). 1934[1949]. 大众语, 土话, 拉丁化(Dazhongyu, tuhua, ladinghua), 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Zhongguo yuwen de xinsheng), P82-83, Beijing(北京): 时代书报出版社(Shidai shubao chubanshe).
- Ying Zu(英祖). 1958. 商业白话信的商榷(Shangye baihua xin de shangque).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6日.
- Zhou Hanmei(周寒梅). 1936. 关于教科书问题(Guanyu jiaokeshu went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17日.
- Zhou Qifeng(周起凤). 1936. 话剧与方言(Huaju yu fangy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9日.
- Zhu Chongke(朱崇科). 2019. 论新华作家苗秀作品中的本土话语(Lun Xinhua zuojia Miaoxiu zuopin zhong de bentu huayu). 《香港文学》2019年第2期, 总第410期, 页79-91